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何兆武  
◎ 著

# 思想与历史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何兆武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何兆武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434-0

I. 思… II. 何…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128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SIXIANG YU LISHI

**思想与历史**

何兆武自选集

何兆武 著

---

项目统筹:杨小兵	责任编辑:杨林玉 马岩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沈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4 插页 1

字 数 402 千

定 价 75.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出版说明

---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10种，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8年11月

## 何兆武自述\*

---

本书是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所选过去的一些文字，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和批判。

我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9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入中央大学附中（由南京迁校）；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1946年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1946年后，按时间顺序，我基本的简历如下：1946—1949年任台北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1950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0—1952年北京图书馆编目员，1952—1956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6—198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1980年曾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交换访问美国学者，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3—1994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

\* 原载《世人学人自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时期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党时期仍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九·一八”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研究生时，二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以及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噶邦福老师(J. J. Gapanovitch)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解放后，自50年代至80年代我参加了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三十年。我以为侯先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

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60年代所流行的观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决定一切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连接不断，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些，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 Halbwachs 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种名家的注释本和 Vaughan 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颉颃，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帕斯卡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学，帕斯卡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但我国的研究者几乎从不提及帕斯卡的名字。我恰好有一本 Brunschvicg 的帕斯卡权威本，所以又偷译了他的《思想录》，并找了几种注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我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斗胆在“文革”期间备尝艰苦地把它译了出来。以后又译过几部书，大都是由于偶然，兴之所至，自己选择的。但其间有两部书是当事人来找我译出的。一部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找到了我，当然是由于我在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缘故。另一部书罗素的《西

方哲学史》的遭遇则颇有点戏剧性了。

50年代罗素曾起劲地大搞和平运动，颇受我国当局的赏识。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已欣然同意。但临行时，高龄已九十有余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克远行。罗素乃以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赠毛，毛遂转交下面译出。当时这类书籍是由商务印书馆分工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便找到了我。（这事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骆静兰学姐亲口告我的。）我虽也有兴趣，但嫌全书过长，译完第一部分之后，便辞掉此事。“文革”中，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之后，批斗我的两大罪状之一就是，我翻译此书乃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以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之权威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本人，可谓开万国亘古未有之奇，使我只敢窃笑而不敢明言。

“文革”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译了几部书，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文集中。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19、20世纪的中国还在补西方18、19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就是在思想上补19世纪实证主义的课。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违反科学），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尽历史学之能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还另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括阶级性在内，但阶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个物种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

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和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1998年



# 目 录



1	<b>何兆武自述</b>	179
1	<b>历史与历史学</b>	179
3	历史与历史学	179
19	历史两重性片论	179
30	历史学两重性片论	181
54	历史学是科学吗?	181
72	对历史学的反思	181
87	<b>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b>	181
89	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	181
	——读康德《历史理性批判》	181
109	“普遍的历史观念”如何可能?	181
	——评康德的历史哲学	181

目  
录



136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	1
159	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1
173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 ——序朱高正《康德四讲》	1
181	“从身份到契约” ——重评梅茵的公式	1
201	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	1
218	反思的历史哲学 ——评罗素的历史观	1
249	历史和历史解释 ——从德雷的新探索谈起	1

北京社科  
名家文库

279	<b>中西文化史论</b>
281	历史坐标的定位
288	历史的坐标应如何定位?
291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397	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介
414	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445	利玛窦与《中国札记》
468	徐光启论
511	阮元与李善兰
521	<b>何兆武著译目录</b>

# 历史与历史学



## 历史与历史学\*

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虽然都可以用“历史哲学”一词来概括，但大抵前者即相当于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相当于所谓的“分析的历史哲学”。

我们通常说的“一部中国史”，可以是指中国过去所发生过的种种事件，也可以是指对这些事件的阐述和解说。史实并不等于我们对史实的理解。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理解，否则的话就没有进行任何历史学研究的必要了。我们可以认为有如此这般的事件发生过，它就是历史。这个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

本篇为何兆武著《历史与历史学》自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 为保留作品发表时的原貌，本书对文中的体例、文字未作大的修改。

则是仅只能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进行，它本身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如果说史实作为材料乃是客观给定的，那么有关它的理论，或者说其中的道理，归根到底都是我们思想构造出来的产物。它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我们思想劳动的结果。

有人认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它即使没有完全地、精确地反映客观的真实，至少也是不断地在趋近于那个真实。那个真实我们习惯上就称之为“真理”。不过，这就要涉及一部例如《真理论》之类的皇皇巨著了。就目前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的而论，我只想明确一点，即：所谓的真理并没有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定位。真理不是北极。如果你是走向北极，你可以向北走，走到了某一点，你就可以说：瞧，这就是北极，再走任何一步就都是脱离了北极而在朝南走了。但是，我们大概永远都不能说：瞧，这就是真理，你再多走一步就背离真理了。人们的认识永远是在前进的，是一个永远无休止的积累历程，它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而不再前进。它永远都在脱离它原来所已经达到的那一点，不断地在超过它自己，有时候甚至于是革命式的超越，革命性地推翻原来的体系，另起炉灶。这种情形就连最严谨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

能说我们的认识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精确地反映真理，但却不断地在趋于真理吗？北极，你可以确切地知道它在哪里，你可以确切地给它定位；因此你虽然还没有走到北极，却可以知道你是在不断地趋近于北极。但真理不像北极，我们无法给它定位，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资格指着某一点说：瞧，这就是真理，再多走一步就是背离它了。如果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是在哪里的话，我们又根据什么来肯定我们是在不断地趋近于这一点呢？

我们历史认识的进步或改变，是受到三个方面条件的制约的。正

由于这三方面条件本身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所以历史学本身也就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不可能是一旦达到某一点就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三个方面的条件如下：一是新材料的发现。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待多说。二是已往的历史事实并非就已经死去了。它们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往往要根据它们的后来的效果去理解和评论它们。历史是个不断的长流，已往的史实（例如孔子）对后来直迄今天和今后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断在变化着的，从而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看法也就随之而变。盖棺并不能就论定。三是历史学家作为已往历史事件的解说者，要受其本人思想意识的制约。一个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超出它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或者说，一个历史学者之理解历史，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犹忆自己做学生时，姚从吾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总是要我们读《资治通鉴》。我读起来总觉得满篇不是老子杀儿子，就是儿子杀老子，毫无趣味可言，远不如看那些缠绵悱恻的小说令人销魂。只是后来自己年龄大了些，生活体验也多了些，才愈来愈感觉到看什么小说都不如看《资治通鉴》那么真实感人，它比什么小说都更加引人入胜。世上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识的奥妙，历史学家不是万能，无法掌握历史的全部真实，何况人类知识又是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的灵心善感能够是如此的广博而又深切，足以领会全部的人类思想感情。历史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能领会前人的思想感情（如老子杀儿子，儿子杀老子之类），那么最多只能说是他知道了（kennen）历史事实，但不能说是理解了或懂得了（wissen）历史。

史料或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历史学家心目之前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



图，而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如果同样的史料或史实就自行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史实本身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理论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历史事件之作为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但是历史学作为对史实的理解和阐释则有高下之别，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与感受能力的水平为转移的。因此，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把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各种史料都是砖瓦，而建立起来一座已往历史的大厦的，则有恃于历史学家这位建筑师心目之中所构思的蓝图。那是它思想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所谓的事实在他心目之前现成的反映。

历史学是科学吗？大概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会显得是多余的。因为多年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点，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性为其唯一的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的归宿。只要一旦被宣布为“不科学”，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历史学仿佛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科学，完全地而又彻底地。（正有如柏里所声称的“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因为是科学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学的；又因为它非科学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的。恰好是这两个方面的合成，才成其为历史学。凡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或应该成为科学的人，于此都可以说是未达一间，正如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所表现的那样，尤其是，有些史家虽然号称高擎历史学的科学性这面旗帜，却没有认真朝着科学性的方向迈步。现代自然